

北京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互动关系的解析

边文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6)

摘要: 产业结构与就业的变动对一个地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的变化, 分析了其演变趋势。同时引入就业弹性分析了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并阐述了北京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问题。最后, 对北京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就业; 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149 (2008) 04- 0039- 05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bor Employment in Beijing

BIAN Wenxia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Chan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for any reg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nges in Beiji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nalyses their evolution trend. The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chan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mployment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of employment and elaborates on the problems arose in rural labor force migration in Beijing and puts forward advice on policies of optimizing labor force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Beijing.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loyment; labor migration

改革开放 30 年来, 北京的经济取得了较快地、持续地发展, 综合实力及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特别是对北京按照“优化城区、强化郊区”的原则, 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后, 大大破除了阻碍北京非农化水平提升的各类因素, 也使全国各地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北京转移, 致使“劳动力就业”日益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收稿日期: 2007- 10- 10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委 2007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北京市就业形势与就业结构前瞻性研究”(SM200710038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边文霞(1973-), 女, 内蒙包头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 劳动计量、就业与创业研究。

一、北京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间的对比变动趋势分析

产业结构的变迁对经济社会产生双重重要冲击：一是影响就业，二是影响所得分配。在就业方面，使得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发生改变，即人力从衰退的产业中释出，而由兴盛的产业吸纳；其次，因各产业使用的劳动力密集度不同，对不同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也有差异，因而也改变劳动力需求量与其职业类别结构。本文所用数据均源自《北京统计年鉴（2006）》和《2006年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经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对比图1与图2可知：自1978年以来，北京积极努力将资本和劳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因此在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具体而言，就是由1978年的28.35:40.06:31.59转变至1988年的15.13:45.81:39.05，再转变至1993年的10.37:44.5:45.13，至此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发生置换，使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变化呈剪刀差状。进入90年代初期，由于北京积极响应国家经济体制转变政策，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和减轻原有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使得一方面北京各大中型国企充满了经营活力，

本市经济在1993年得以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出现严重结构性失业；随后北京抓住了历史性机遇，迅速从一个“二三一”结构的重化工业基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三二一”转型，特别是此时的北京第二产业已经站到了倚重高新技术的新型工业化的基点上，北京的第三产业也正在成长为：为国际化大都市和新型工业化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平台。理论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必将引导着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因此北京就业结构从1993年开始从原有的“二三一”结构转变为“三二一”结构。

进入21世纪后，北京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出现稳定迹象，从2001年的2.12:30.79:67.09到2004年的1.54:30.59:67.87，似乎变化已经到了一个不容易突破的界限，表明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再支持其大幅度提升，而新兴第三产业还没有集聚足够的张力。而到2005年北京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新兴服务业已经代替了传统服务业成为第三产业的中坚力量，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教育与文化产业，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北京就业结构也由2002年的9.95:34.64: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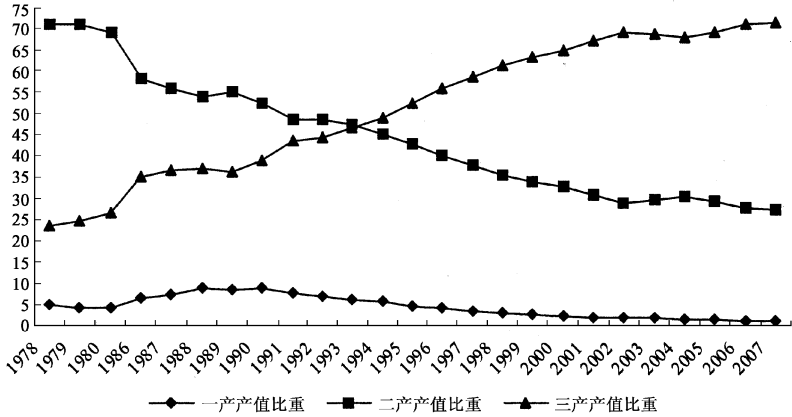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06年北京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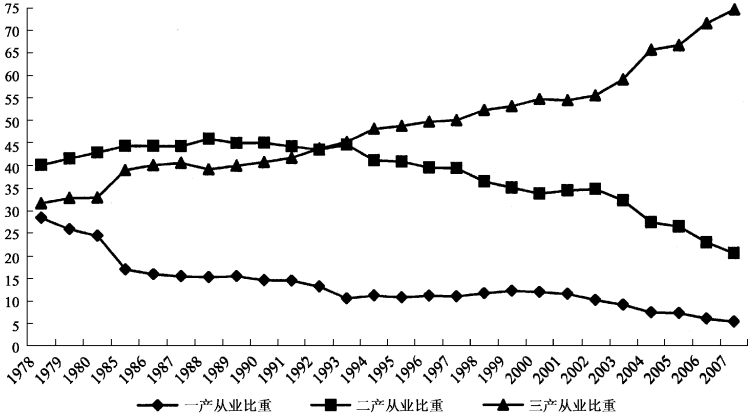


图2 1978~2006年北京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图

转变至 2006 年的 6. 82 25. 64 66. 03。

我们课题组利用双对数线性模型，可知近 20 年来北京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的关系，即按模型所给出的就业弹性，将北京经济发展与就业形势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高经济增长与高就业增长模式，1986~ 1994 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 0. 87；阶段二：高经济增长与就业衰退模式，1995~ 1999 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 0. 141；阶段三：高经济增长与低就业增长模式，2000~ 2006 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 0. 482。而阶段三恰是新兴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取代传统服务业成为主导，这意味着北京就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当然也意味着北京劳动力供给层次需要全面升级，即那些无技能或技能水平低下的劳动力将出现就业困难情况^[1]。此时，也正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 所认为，“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已出现重大拐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企业即使一分钱工资不涨，也能源源不断找到劳动力。但是到这一点以后，如果不加强、不提高激励手段，不提高工资、提高福利，不改善工作条件，不减少工伤事故，企业就会雇不到所需要的劳动力”^[2]。

二、北京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分析

我们以房山区为例，对北京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房山区属于北京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五个区和亦庄开发区）中的一员，而发展新区战略功能在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及承担北京大都市制造业发展的职能，且是北京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与人口的重要区域，是未来北京经济重心之所在。北京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就业间矛盾在当前的房山区得以表现：先是驻区中央、市属企业深化改革，实行减员增效，大批职工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关系，成为社会失业人员；其次是根据北京市的战略性功能布局调整，房山区的煤、砖、灰、沙、石企业相继关闭，大批从业人员及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员失去工作。另外，随着北京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今后仍将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必须离开土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几种因素汇聚，给房山区的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几年来房山区失业率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究其原因，我们课题组发现这也是北京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就业时突出表现出来的问题。

1. 北京就业竞争十分激烈

北京就业机会较多，劳动政策比较公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因而在北京出现的就业机会，并不一定由北京人独得，更不一定由郊区农民获得。

2. 北京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有待提高

首先，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高，大多仅限于农、林、牧、渔业知识，内容简单，对外出就业帮助不大；其次，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具有专业技能的比例非常低，就业渠道较少，即便就业了也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强度大，工资收入低。以房山区关矿地区为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北京房山关矿地区未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状况 （2007 年 5 月数据）						%
因素名称	学历结构	因素名称	技能结构	因素名称	年龄结构	
初中及以下	72. 40	无技能	93. 64	16~ 29 岁	19. 71	
高中及同等学力	24. 50	初级	5. 89	30~ 39 岁	33. 89	
大专及以上	3. 10	中级	0. 47	40~ 49 岁	35. 11	
		高级及以上	0	50 岁及以上	11. 30	

当前，发展新区主要承担着北京大都市制造业发展的职能，而制造业几乎包含了第二产业中除建筑业和能源业以外的所有其他行业，从大制造的概念出发，制造业包含从社会需要出发的产品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等的一个完整体系。因此，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绝不仅仅是传统

意义上的操作工，而是包含有市场需求分析、工程设计、产品加工、检验、物流、经营管理、采购销售、质量控制、生产管理、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的内容，人才培养必须适应这样的需要。

北京的制造业与全国的制造业有着共同的问题。据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制造业强国的 5%，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素质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中，高级技师及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及初级工的比例为 35: 50: 15，我国沿海一个省会城市的抽样调查比例为 2: 4: 94。目前我国数控技术应用领域操作人员每年需增加 100 万人左右，汽车维修行业每年需新增 30 万人，但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必须靠职业教育来解决。先进的技术可以引进，现代的管理模式可以借鉴，高精尖人才也可以引进，但大批量的高级技术工人是不可能引进的，只能靠职业教育来解决。

3. 北京农村劳动力对收入的要求相对较高

随着北京就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北京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尤其以城镇居民收入提高的更加迅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65.4 元增至 2006 年的 19978 元。对北京城镇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更为明晰。

2007 年，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北京居民收入处于我国平均线之上。纵观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整体收入状况，用恩格尔系数描述大体经历了“高位徘徊——波动下降——较快下降”的变动过程。1978~ 1984 年为高位徘徊期，恩格尔系数为 55.3%~ 59.4%，意味着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食品支出，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处于刚刚摆脱贫困、进入温饱的初级阶段；1985~ 1995 年为波动下降期，10 年间恩格尔系数从 1985 年的 50.6% 下降到 1995 年的 48.5%，仅下降 2.1 个百分点，1993 年恩格尔系数首次下降至 50% 以下；1996 年以来，北京市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速度明显加快，2006 年恩格尔系数为 30.8%，比 1996 年下降了 15.8 个百分点。

虽然收入水平的增长是由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原因带来的，但对于一般收入者来说通过就业获取收入是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途径，因此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更多的是就业结构变动的结果，包括劳动者本身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工作等多方面的因素。受北京城镇化加速的影响，北京农村居民更多的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但是由于北京郊区农村经济比同类其他地区较为发达，因此，北京近郊农民对就业工种和收入的期望也较高。据调查，北京郊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年薪期望值，比京郊的外地从业人员的年均收入高出 3249 元。

三、对北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经过对北京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关系的深入探讨，可知造成北京当前就业困境，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困境的内因是北京经济结构的变化、产业的兴衰转移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等所导致。但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要想使失业、停业、歇业率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指导性指标数，相关政府部门还需经过三个层次的转变。

第一层次：思想方式的转变。政府部门对待未就业群体的思想方式亟须转变，即基层政府亟须从过去一味扶困的输血功能思想轨道转向增强就业困难群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的思想轨道上来。具体而言，就是要灌输弱势群体做强者的思想，要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摆脱贫困，走向幸福。

第二层次：培训方式的转变。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是解决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关键，而我国各地近些年基本上是开展普遍培训，致使就业困难群体的专业技能水平得不到提高，适应不了市场需求。而现在企业需要的不是大众人才，而是专业技能人才。因此，基层政府部门通过

大力发展专业培训,可以使就业困难群体由体力型向技术型和智力型转变,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并驾齐驱快速增长。

首先,明确培训的重点,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要采取科学方法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入的调查,依据行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要使各类教育机构培训科目和劳动者的培训需求有机结合,逐步形成高、中、初三个教育层次相互衔接,学位证、毕业证、技术证等各种教育目标相互配合,正规教育与业余培训相互补充,分工相对明确、层次较为分明的教育培训体系,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人员的需要。

其次,要改革过去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培养模式,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半工半读的培养模式。半工半读不仅可以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有更多的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而且可以使企业拥有更多优秀的员工,是企业、学生和学校“三赢”的好事。

再次,要把握度量,实施订单培训。对就业困难群体培训,即要针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迫切需要来设置相关专业课程,同时,课程设置的深度和广度以满足工种技术等级的需要为基准。另一方面要把握培训人员的数量,做到“订单”培训。若培训人员太多,部分培训人员不能及时上岗,就会挫伤积极性;而若培训人员太少,又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因此,把握度量,实行订单培训,这是搞好就业困难群体培训的重要环节。

第三层次:引导就业方式的转变。基层政府部门要引导就业困难群体从过去的消极“坐等岗位”就业模式,转变到积极“主动创业”的就业模式。具体而言,首先,通过新闻媒体、经验交流会、对口帮教等方式与方法,大力宣传创业典型,营造良好创业氛围,激励群众踊跃创业。其次,要向创业者提供帮助。一方面,政府应积极为这些艰苦创业的群众提供技术、经济和政策上的扶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创业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各界特别是同行企业,要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和谐创业、顺利创业、成功创业。

参考文献:

[1] 周斌. 北京就业结构实证分析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7, (3).
[2] 吕福明. 我国劳动力转移出现重大拐点 [N]. 中国改革报, 2007- 08- 02.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9 页)

城市化阶段的不同,我国人口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与许多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其先进经验,探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应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形势的人口管理办法,这也是我国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丁金宏,刘振宇,程丹明等. 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 [J]. 地理学报, 2005, 60 (1): 106.
[2] Philip Redfem. Population Registers: Some Administrative and Statistical Pros and Cons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89, 152 (1): 10- 12.
[3] Carsten Bocker Pedersen. The Danish Civil Registration System [J]. Danish Medical Bulletin, 2006, 53 (4): 442.
[4] Heinonen and Laihonen. Some new solutions and methods for

census data production: Finnish experiences from the 1985 census [A].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ians Seminar on Computer related Aspect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es. 1987, Belgrade.

[5] John R. Weeks. Popu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cepts and Issues [M].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9- 22.
[6] 田炳信. 中国第一证件: 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13- 14.
[7] 王新华译. 日本户籍法 [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152- 159.
[8] 于静文. 国外农民怎样弃村进城 [J]. 中国经济周刊, 2004, (28): 36.
[9] 蒋正华,张玲广. 人口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5): 56- 59.

[责任编辑 崔凤垣]